

我们教育的错误原则

或人文主义与现实主义

麦克斯·施蒂纳

由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努力寻找一个可以表达其精神的词，许多名字出现在人们面前，而且都声称是正确的名字。我们的时代在各方面都显示出最混乱的党派骚动，当下的雄鹰聚集在过去腐朽的遗产周围。到处都有大量的政治、社会、教会、科学、艺术、道德和其他方面的尸体，除非它们被全部消耗掉，否则空气将不干净，生物的呼吸将受到压迫。

没有我们的协助，时间不会让正确的话语出现；我们必须共同为之努力。然而，如果如此依赖我们，我们可以合理地询问他们对我们做了什么，以及他们打算对我们做什么；我们要问的是，他们试图通过教育使我们成为这个词的创造者。他们是有意识地培养我们成为创造者的倾向，还是只把我们当作天性只允许训练的生物？这个问题与我们的社会问题一样重要，事实上，它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建立在这个终极基础上。成为优秀的人，你就会带来优秀的东西：“每个人在自己身上都是完美的，”那么你的社会，你的社会生活，也将是完美的。

因此，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他们在我们的可塑性时期对我们的影响；学校问题是一个生活问题。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些问题；这个领域多年来一直以一种热情和坦率的态度进行斗争，这种态度远远超过了政治领域，因为在那里它不会受到专制权力的阻挠。

一位可敬的老者，西奥多·海因修斯教授¹，与已故的克鲁格教授²一样，在年老时仍保持着他的力量和热情，最近试图通过一篇小文章来激发人们对这一事业的兴趣。他称其为“学校与生活之间的协约，或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调解人文主义和现实主义”。两方为胜利而斗争，每一方都想推荐他的教育原则，认为它是满足我们需要的最好和最真实的原则：人文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海因修斯不想招致任何一方的不满，他在小册子中以温和与和解的方式说话，这意味着给予双方应有的待遇，从而对事业本身造成了最大的不公正，因为它只能由一个尖锐的决定性来服务。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对事业精神的罪过仍然是所有胆小的调解人不可分割的遗产。”协约”只提供了一个懦弱的权宜之计。

只有像男人一样坦诚：赞成或反对！

和口号：奴隶或自由！

甚至众神也从奥林匹斯山上降临，

并在他们盟友的城垛上作战。

¹ Otto Friedrich Theodor Heinsius (1770–1849), 语言学家、教授，后来成为柏林 Couvent-Gris 的主任，着有几本备受推崇的语法和词典、德国文学史。施蒂纳引用的书是 *Konkordat zwischen Schule und Leben, oder Vermittelung des Humanismus und Realismus, aus nationalistic Standpunkt betrachtet*, 由 Schultze 于 1842 年在柏林出版。他的 *Zeitgemäße Pädagogik der Schule: historisch und kritisch aufgefaßt für das gesammte Schulpublikum* 也很有用，1844 年在柏林出版。

² Wilhelm-Traugott Krug (1770–1842), 著名的德国自由主义哲学家和文学人物，伊曼纽尔·康德的继任者，1805 年在柯尼斯堡担任逻辑和形而上学主席，1809 年至 1834 年在莱比锡任哲学教授。克鲁格在 1813 年暂停了他的学术生涯以对抗拿破仑，随后担任图根联邦主席。他创作了多部作品，其中几部是两到五卷的系列作品。

在提出自己的建议之前，海因修斯对宗教改革以来的历史进程做了一个简短的概述。在宗教改革和革命之间的时期，我将在此断言，因为我打算在另一个机会更详细地展示它，即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的关系，统治者和服务者之间的关系，有权势者和无权势者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就是服从的时期。除了任何其他可能证明优越性的基础之外，教育作为一种力量，使拥有它的人超越了缺乏它的弱者，而受教育的人在他的圈子里，无论大小，都是强大的，有力量的，有威严的：因为他是一个权威。不是每个人都能被称为这种命令和权威；因此，教育不是为每个人准备的，普及教育与这一原则相矛盾。教育创造了优越性，使人成为主人：因此在那个主人的时代，教育是获得权力的手段。但是，大革命突破了主仆经济，产生了一个公理：人人都是自己的主人。与此相联系的是一个必要的结论，即教育-实际上是培养主人-必须从今以后变得普遍，而寻找真正的普遍教育的任务现在出现了。争取实现人人都能接受的普及教育的努力，必须推进与顽固维持的排他性教育的斗争，在这一领域，革命也必须对宗教改革时期的统治拔出剑来。普及教育的理念与排他性教育的理念发生了碰撞，这场纷争和斗争在各个阶段和各种名称下进行着，直到现在。对于对立的敌方阵营的矛盾，海因修斯选择了人文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个名字，尽管它们不准确，但我们将保留它们作为最常用的名字。

在启蒙运动于十八世纪开始传播其光芒之前，所谓的高等教育毫无异议地掌握在人文主义者的手中，而且几乎完全基于对古老经典的理解。另一种教育也在同时进行，它同样在古代寻找自己的榜样，并主要以对《圣经》的大量了解而告终。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选择了古代世界最好的教育作为他们的唯一主题，这充分证明了我们自己的生活所提供的尊严是多么的少，我们离能够从我们自己的原创性中创造出美的形式和从我们自己的理性中创造出真理的内容还有多远。首先，我们必须学习形式和内容；我们是学徒。正如古代世界通过经典和《圣经》作为女主人统治着我们一样，可以从历史上证明的是，作为主宰和作为仆人确实是我们所有活动的本质，只有从这个时代的特点来看，才会明白为什么他们如此公开地渴望“高等教育”，并如此刻意地通过这种方式在普通人面前突出自己。有了教育，其拥有者就成了未受教育者的主人。大众教育会反对这一点，因为人们应该留在有学问的绅士们对面的俗人中，只应该惊奇地注视着奇怪的辉煌，并对其表示敬意。因此，罗马主义在学习中继续，它的支持者是拉丁语和希腊语。此外，这种教育在整个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保持着正规的教育，就像这是因为古代早已死亡和埋葬，只有形式，就像文学和艺术的计划被保留下来一样，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是，对人们的统治将简单地通过形式上的优势来获得和宣扬；只需要一定程度的智力敏捷性就可以获得对不太敏捷的人的优势。因此，所谓的高等教育是一种优雅的教育，是一种全然优雅的感觉，是一种品味和形式感的教育，它最终有可能完全沉沦为一种语法教育，并使德语本身散发出拉蒂姆的气味，以至于即使在今天，人们也有机会欣赏到最美丽的拉丁文句子结构，例如，在刚刚出版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州的历史》里。一本给大家的书³。

³ Geschichte des 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n Stateates. Ein Buch für Jedermann 于 1842 年出版。作者 A. Zimmermann 是一个非常难以捉摸的人物，即使在今天也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有一次，他误将威廉·齐默

同时，在启蒙运动中逐渐产生了反对这种形式主义的精神，对全面的、真正的人类教育的要求与对人的安全和普遍权利的承认相结合。到那时为止，人文主义者所采取的方式阐明了缺乏与生活互动的扎实教育的问题，并产生了对实用精修教育的要求。从此以后，所有的知识都是生活，知识就是生活；因为只有知识的现实才是它的完美。如果把生活的材料带入学校，就能成功地为每个人提供有用的东西，并为此赢得每个人对生活的这种准备，使他们转向学校，那么人们就不会再羡慕博学的先生们的奇特知识，人们也就不再是俗人了。消除学者的神职和人民的俗职是现实主义的努力，因此它必须超越人文主义。挪用古代的古典形式开始受到约束，主权-权威也随之失去了它的光环。时代在与传统的对学术的尊重作斗争，因为它通常会对任何尊重进行反抗。

学者的基本优势，即普及教育，应该对每个人都有利。然而，人们会问，除了琐碎地表达为“能够谈论一切”的能力，或者更严肃地表达为掌握任何材料的能力之外，普及教育是什么？学校被认为是被生活甩在了后面，因为它不仅退出了人民，甚至忽视了对学生的普及教育，而选择了排他性的教育，它没有敦促人们在学校里掌握大量由生活强加给我们的材料。人们认为，学校确实要勾勒出我们与生活中的一切相协调的轮廓，并对其加以呵护，以便使我们有一天必须关注的事物中没有一件是与我们完全陌生的，是我们无力掌握的。因此，人们最积极地寻求对当前事物和情况的熟悉，一种必须适用于每个人的教育学被引入，因为它满足了每个人在他们的世界和时间中找到自己的共同需要。人权的基本原则以这种方式在教育领域获得了生命和现实：平等，因为这种教育包含了每个人；自由，因为一个人变得熟悉自己的需求，从而变得独立和自主。

然而，像人文主义所教导的那样抓住过去，以及现实主义的目标-抓住现在，都只能导致对短暂的权力。只有了解自己的精神才是永恒的。因此，平等和自由只得到一种从属的存在。一个人确实可以变得与他人平等，并从他们的权威中解放出来；从与自己的平等中，从我们短暂的人与永恒的人的平等与和解中，从我们的自然性向精神性的转变中，总之，从我们自我的统一性和最高权力中，因为它没有留下任何异己站在自己之外，所以对它几乎没有任何想法是可以在这个原则中得到承认。而自由的确是作为独立于权威而出现的，但是，它缺乏自我决定，仍然没有产生一个在自己身上自由的人的行为，一个不考虑的人⁴的自我启示，也就是那些从沉思的波动中拯救出来的头脑之一。受过正式教育的人当然不会再在普遍教育的海洋的镜子上脱颖而出，他把自己从一个“高度受教育的人”变成了一个“片面受教育的人”（作为这样的人，他自然保持着自己无可争议的价值，因为所有的普遍教育都是为了辐射到特殊教育的最多样的单一心态）；但在现实主义意义上受教育的人并没有超越与他人平等和脱离他人的自由，他也没有走在所谓实用的人前面。当然，人文主义者、花花公子的空洞优雅不可能不衰落；

尔曼（Wilhelm Zimmermann, 1807-1878 年）误认为是一位多产的通俗历史作家，其中许多历史著作出现在 1840 年代和 1850 年代的几十年中。

⁴ 参见。格。rücksichtslos, 在这里以特殊意义使用，作为沉思的反面，而不是粗鲁或轻率的。

但胜利者却闪烁着物质的光泽，只不过是一个无味的物质主义者⁵。可以肯定的是，唯物主义俱乐部的活木头会砸碎无髓的丹迪的干杖；但活木头或死木头仍然是木头，如果精神的火焰要燃烧，木头必须在火中升起。

同时，如果（不否认它的能力）它吸收了人文主义的好的方面，为什么现实主义也必须灭亡？

当然，它可以吸收人文主义的不可剥夺的和真正的正规教育，而且这种吸收通过已经成为可能的科学方法和对所有教学对象的合理处理而变得越来越容易（我仅以贝克尔⁶对德语语法的解释为例提请注意），并且可以通过这种改进把它的对手从它的强势地位上推倒。由于现实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出发点都是教育的目的是为人培养多才多艺，由于两者都同意，例如，人必须习惯于成语表达的每一个转折，必须在数学上强调证明的转折，等等，因此，人必须在处理材料时努力争取掌握，争取掌握它：因此，即使现实主义最终也会承认品味的形成是最终目标，并把形成的行为放在首位，这肯定不会失败，正如部分情况已经是这样。因为在教育中，所有给定的材料只有在儿童学会用它做什么，使用它的时候才有价值。当然，正如现实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只应强调实际和有用的东西；但好处实际上只在形成、归纳、展示中寻求，而且人们将无法拒绝这种人文主义的主张。人文主义者是对的，因为它首先取决于正规教育—他们是错的，因为他们没有在每一门学科的掌握中找到这一点；现实主义者要求的是正确的，因为每门学科都必须在学校开始，那么当他们不想把正规教育看成主要目标时，他们的要求就是错误的。如果它真正地自我放弃，不把自己交给物质主义的诱惑，现实主义就能战胜它的对手，同时与他达成和解。然而，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对它表示敌意？

那么它是否真的抛开了旧原则的外壳，站在了时代的壁垒上？在这一点上，一切都必须加以评判，它是否承认时间所实现的理念是其最有价值的，或者它是否在它身后占据了一个固定的位置。这种不可磨灭的恐惧使现实主义者对抽象和猜测惊恐地退缩，因此我现在将在这里列出海因修斯的一些选段，他在这一点上没有向不屈不挠的现实主义者屈服，并让我免于引用他们的引文，这很容易被引用。在第9页，他说

” 在高等学府，人们听到了希腊人、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哲学体系，毫无疑问，也听到了现代人的哲学体系，康德的哲学体系，他把上帝、自由、不朽的观念作为不可证明的东西而抛弃了；费希特的哲学体系，他把道德的世界秩序代替了个人的

⁵ 参见。格。实业家。从上下文来看，没有证据表明施蒂纳的批评是针对我们今天所说的工业家或制造商的。也许我们在这里能得出的最接近他的想法的是 Albert Jay Nock 的术语，“经济主义”，描述了一种几乎完全致力于为生产和消费而生产和消费商品的生活，而不是为了他们有区别地享受。

⁶ 卡尔·费迪南德·贝克尔 (Karl Ferdinand Becker, 1775-1849)，著名的德国语法学家，德语语音逻辑的学生，句法和文体领域的创新者。他的 *Deutsche Grammatik* 于 1829 年出版，他的 *Organismus der deutschen Sprache* 于 1841 年出版了第二版。

上帝；谢林、⁷黑格尔、赫尔巴特、⁸克劳斯、⁹以及任何可能被称为超自然智慧的发现者和先驱的人。他们说，我们应该，德意志民族应该着手处理理想主义的热情，这种热情既不属于经验科学和实在科学，也不属于实际生活，而且对国家没有好处，这种模糊的认识只会混淆时代的精神，导致不相信和无神论，分裂人们的思想，把学生自己从使徒的教授椅上赶走，甚至模糊了我们的民族语言，因为它把最清晰的常识概念变成神秘的谜团？这就是应该教育我们的年轻人成为有道德的好人，有思想的人，有理智的人，真正的公民，在他们的职业中 useful 和有能力的工人，有爱心的配偶和建立家庭幸福的父亲的智慧吗？”

而在第 45 页。

”让我们看看哲学和神学，它们作为思维和信仰的科学被放在了世界福祉的首位；自从莱布尼茨打破了通往它们的道路，它们通过相互摩擦变成了什么？二元论、唯物论、唯心论、超自然主义、理性主义、神秘主义，以及所有夸张的猜测和感情的滥觞：它们给国家、教会、艺术、民族文化带来了什么样的祝福？思想和知识在它们的范围内当然扩大了；然而，前者是否变得更清晰，后者是否更确定？宗教，作为一种教条，更加纯洁，但主观的信仰却更加混乱，被削弱，缺乏支持者，被批评和解释所动摇，或者被转化为狂热主义和虚伪的圣洁外表，而教会呢，哦，它的生命是分裂或死亡。难道不是这样吗？”

那么，现实主义者出于什么原因对哲学表现得如此不友好？因为他们误解了自己的使命，并竭力想继续受到限制，而不是成为不受限制的人！他们为什么讨厌抽象事物？他们为什么讨厌抽象的东西？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抽象的，因为他们从自己的完美中抽象出来，从升华到救赎的真理中抽象出来！

我们想把教育学交到哲学家的手中吗？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他们会表现得很笨拙。它只应委托给那些比哲学家更多的人，在这方面，他们甚至比人文主义者或现实主义者更多。后者的方向是正确的，因为即使是复活也会跟随他们的衰落：他们从哲学中抽象出来，以便在没有它的情况下达到他们充满目的的天堂，他们跃过它，落入他们自己的空虚的深渊；他们像永恒的犹太人一样，是不朽的，不是永恒的。

⁷ 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 (Friedrich Wilhelm Josef von Schelling, 1775-1854)，德国哲学界的重要人物，同时也是一位物质语言学家。

⁸ 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 (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1776-1841)，德国哲学家，哲学家和哲学的批评家，沃尔夫和康德的弟子，后来成为康德和黑格尔的批评家。他曾是耶拿的教授，后来又在柯尼斯堡和哥廷根任教授，他的著作包括几部关于教育学和教育理论的著作，在德国广为人知。

⁹ 卡尔·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克劳斯 (Karl Christian Friedrich Krause) (1781-1832)，哲学领域的多产作家，尤其是关于学习理论的主题。他是近二十五本书和许多小作品的作者，其中一些是在死后出版的。

只有哲学家能够死亡，并在死亡中找到真正的自我；随着他们的到来，改革的时期，知识的时代就会消失。是的，知识本身必须死亡，以便在死亡中再次绽放出意志；思想、信仰和良知的自由，这些三个世纪的美妙花朵将沉入大地母亲的怀抱，以便新的自由，意志的自由，将得到其最崇高的汁液的滋润。知识及其自由是那个时代的理想，它最终在哲学的高地上得到了实现：在这里，英雄将为自己建造一个火堆，并将在奥林匹斯山上拯救自己的永恒部分。有了哲学，我们的过去就结束了，哲学家是思想时代的拉斐尔，有了哲学，古老的原则就会在明亮的色彩中完善自己，并通过恢复活力从短暂的变成永恒的。从今以后，谁想保留知识，谁就会失去它；然而，谁放弃它，谁就会得到它。[与《马太福音》10:39和《路加福音》17:33比较]只有哲学家被召唤去放弃和获得：他们站在烈火面前，像垂死的英雄一样，如果不朽的精神要得到自由，他们必须燃烧自己的凡人身体。

必须尽可能地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这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不断出现的错误，即知识没有达到完整和清晰的程度，它仍然是一种物质和形式，一种积极的东西，没有上升到绝对的程度，它像一个负担一样把我们压在下面。像古人一样，人们必须希望遗忘，必须喝下受祝福的Lethe：否则就不会清醒过来。一切伟大的事物都必须知道如何死亡，并通过死亡来改变自己；只有可怜的人像冻僵的最高法院一样积累，¹⁰在文件上堆积，并在精致的瓷器中扮演千年的角色，就像中国人不朽的童真。当适当的知识不再是知识而再次成为简单的人类驱动力，即意志时，它就会完善自己。因此，举例来说，一个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呼唤”考虑了多年的人，会在一个简单的感觉的Lethe中沉没所有的关心和寻求的朝圣之旅，一个从他发现前者的那个时刻开始逐渐引导他的动力。他在无数条研究道路上追踪的”人的呼唤”，一旦被确认为道德意志的火焰，就会迸发出来，并点燃这个不再为寻求而分心的人的胸膛，重新变得清新自然。

起来，沐浴，不知疲倦的瞳孔，
黎明红光中你尘世的胸膛。¹¹

这就是知识的终结，同时也是知识的不朽和永恒：再次变得简单而直接的知识，在新的形式和每一个行动中重新设定和显示自己为意志。意志并不是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就像那些实践者非常想向我们保证的那样；人们不能为了立即站在意志中而超越对知识的渴望，但知识在使自己脱胎换骨并把自己创造成一个”建造自己身体”的精神时，就完善了自己的意志。因此，坚持任何不以这种死亡和这种知识升天为终点的教育，这种尘世生活的脆弱，形式主义和物质主义，花花公子，和物质主义。一种知识如果没有精炼和集中，以至于它被意志带走，或者换句话说，一种知识只是作为一种归属和财产而给我带来负担，而不是完全和我一起走，以便自由移动的自我，不被任何拖累的财产所束缚，以一种新鲜的精神穿过世界，那么这样一种知识，如果没有成为个人，就为生活提供了一种糟糕的准备。人们不想让它进入抽象状态，

¹⁰ 对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旧最高法院的提及，在施蒂纳的时代，该法院实际上已经失效了一个多世纪，但由于缺乏任何执行判决的手段而继续其正式存在。

¹¹ 出自歌德的《浮士德》，这句话为几代德国学生所熟知。

在这种状态下，所有具体知识的真正奉献将被首次传授：因为通过它，物质将真正被杀死并转化为精神；然而，人类将获得实际和最后的解放。只有在抽象中才有自由：自由人只是赢得了赐予，并将被质疑地从自己身上引诱出来的东西重新纳入他的自我统一中的人。

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的动力是，在赢得思想自由之后，追求它的完美，通过它改变为意志的自由，以实现后者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原则，那么教育的最终目标就不能再是知识，而是从知识中产生的意志，而它必须为之奋斗的口语表达就是：个人或自由人。真理本身不外乎是人对自己的揭示，而这属于对自己的发现，从所有异己的东西中解放出来，从所有权威中最大限度地抽象或释放，重新赢得自然。这种彻底的真正的人不是由学校提供的；如果他们仍然存在，他们也是不顾学校而存在的。这确实使我们最多成为事物的主人，也是我们本性的主人；但它并没有使我们成为自由的本性。任何知识，无论多么彻底和广泛，任何聪明和敏锐，任何辩证法的复杂性，都不能使我们免于思想和意志的共同性。如果我们不自私地走出来，这确实不是学校的功绩。每一种相应的骄傲和每一种贪婪之风、对职位的渴望、机械和奴颜婢膝、虚伪等等，都与广泛的知识 and 优雅的古典教育一样紧密相连，由于这整个教育对我们的道德行为没有任何影响，因此它经常落入被遗忘的命运，就像它没有被使用一样：人们甩掉学校的灰尘。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人们只在形式上或物质上寻求教育，最多就是在这两个方面；而不是在真理上，在真正的人的教育上。当现实主义者要求学生应该找到并理解所学的东西时，他们确实取得了进步。例如，Diesterweg¹²知道如何大谈特谈“经验原理”。但是，即使在这里，目标也不是真理，而是某种积极的东西（宗教也必须被视为积极的东西），学生被引导去与他的其他积极知识的总和取得一致和连贯，而根本没有把它提高到经验和沉思的粗糙状态之上，也没有任何激励去进一步用他通过沉思获得的思想去工作，并从中产生，也就是说，去投机，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与道德和行为一样多。相反，教育理性的人，这就足够了；它并不是真正为理智的人准备的；理解事物和条件，这件事就结束了，理解自己似乎并不是每个人都关心的。因此，无论是根据其形式上的一面还是同时根据其物质上的一面，感官都是为积极的一面而促进的，并教导人们：使自己与积极的一面相协调。在教育学上，就像在其他一些领域一样，不允许自由爆发，不允许反对派的力量插嘴：他们想要顺从。只有正式的和物质的训练才是目的，只有学者才能从人文主义者的实验室里出来，只有“有用的公民”才能从现实主义者的实验室里出来，这两个人实际上都只是顺从的人而已。

我们良好的反叛背景得到了强烈的压制，随之而来的是知识对自由意志的发展。那么学校生活的结果就是菲利宾主义。就像我们在童年时发现并渗透到我们所面对的一切事物中一样，我们在以后的岁月中也会发现和表现自己，顺从于时代，成为时代的仆人和所谓的好公

¹²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威廉·迪斯特韦格 (Friedrich Adolf Wilhelm Diesterweg, 1790-1863 年)，强大的德国语言学家和教育评论家，1832 年柏林师范学院院长。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计划，他被广泛称为瑞士教育改革家约翰·海因里希·佩斯塔洛齐 (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1746-1827 年) 的模仿者和继承者。Diesterweg 是两份相当重要的教育期刊的编辑，在遭受多年的猛烈攻击后，于 1850 年被迫退休。与克鲁格教授一样，他在法国受到高度评价。

民。那么，在哪里可以加强反对的精神，以取代到目前为止所培养的顺从，在哪里可以教育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而不是一个学习型的人，在哪里教师会变成一个同工，在哪里认识到知识会变成意志，在哪里自由人可以算作一个目标，而不是仅仅受过教育的人？遗憾的是，目前只在少数地方。洞察力必须变得更加普遍，不是为了让教育、文明、人类的最高任务得到决定，而是为了自我应用。教育会因此而被忽视吗？就像我们不愿意承受思想自由的损失，而把它变为意志自由并美化它一样。如果人把自己的荣誉放在依靠自己、认识自己和应用自己上，从而在自力更生、自我主张和自由中，那么他就会努力摆脱无知，因为无知使陌生的不可穿透的物体成为他自我认识的障碍和阻碍。如果人们唤醒了人的自由观念，那么自由人就会不断地去解放自己；相反，如果人们只是教育他们，那么他们就会在任何时候都以最有教养和最优雅的方式来适应环境，并退化为屈服的畏缩的灵魂。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有天赋和受教育的对象是什么？轻蔑的、微笑的奴隶主和他们自己的奴隶。

现实主义者可以为他们的优势感到自豪，因为他们不是简单地教育学者，而是教育理性和有用的公民：事实上，他们的基本原则：“一个人教导一切与实际生活的关系，”甚至可以作为我们时代的座右铭，只要他们不在普通意义上解释真正的实践。真正的实践不是在生活中闯荡，而知识的价值在于人们可以利用它，从而保证自己的实际目标。此外，最高的实践是，一个自由的人揭示自己，而知道死亡的知识是提供生命的自由。”实际的生活！”说到这里，人们认为自己已经说了很多，而且，即使是动物也过着彻底的实践生活，一旦母亲完成了理论上的断奶期，它们要么随心所欲地在田野和森林中寻找食物，要么被套上枷锁服役。谢特林¹³以他的动物灵魂科学将把这种比较引向更远的地方，引向宗教，这一点从他的《动物灵魂科学》中可以看出，这本书正是因为把动物与文明人如此接近，文明人与动物如此接近，所以非常具有指导意义。这种“为实际生活进行教育”的意图只带来了有原则的人，他们按照格言行事和思考，但没有原则的人；有法律意识，没有自由意识。思想和行动的整体性在不断运动和恢复活力的人是另一回事，忠于自己信念的人又是另一回事：信念本身没有动摇，没有像不断更新的动脉血一样通过心脏跳动，而是像固体一样凝固，即使赢得了，没有敲进脑袋，也肯定是积极的东西，更重要的是，算作神圣的东西。

因此，现实的教育很可能培养出强壮、勤奋和健康的人，不可动摇的人，真实的心；这对我们美丽的女性来说确实是无价的收获；但永恒的人物，在他们身上，不变只在于他们每时每刻自我创造的不懈洪流，因此他们是永恒的，因为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形成自己，因为他们把他们实际外表的暂时关切从他们永恒的精神的永不枯萎或老化的新鲜和创造性活动中设定出来，他们不是由这种教育产生。所谓健全的性格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种僵硬的性格。如果它要成为一个完美的性格，那么它必须同时成为一个受苦的性格，在不断的再生和重生的幸福激情中颤抖和颤抖。

¹³ Peter Scheitlin 的 Versuch einer vollständigen Thierseelenkunde 于 1840 年在斯图加特和图宾根出版。

因此，所有教育的半径都汇集到一个中心，这个中心被称为人格。知识，不管是学术性的和深刻的，还是广泛的和可理解的，只要它没有消失在自我的无形之处，没有从那里作为意志、作为超感官的和不可理解的精神而全然爆发出来，就仍然只是一种占有和归属。知识经历了这种转变，当它不再仅仅依附于对象时，当它成为知识本身时，或者，如果这看起来更清楚的话，当它成为对观念的知识时，是心灵的自我意识。然后，它可以说是把自己变成了心灵的驱动力和本能，变成了一种潜意识的知识，如果把它与他自己的许多全面的经验如何升华为人们称之为策略的简单感觉相比，每个人至少都能想象得到：从这些经验中抽出的一切分散的知识都集中成直接的知识，他据此在瞬间决定了自己的行动。然而，知识必须穿透这种非物质性，同时它牺牲了它的凡人部分，并且作为不朽的成为意志。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教育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在于，知识没有提炼成意志，没有应用到自己身上，没有纯粹的实践。现实主义者感觉到了这种需要，并通过培养没有思想和束缚的“实践者”来提供这种需要，尽管是以一种最悲惨的方式。大多数大学生都是这一悲惨事件的活生生的例子。以最优秀的方式训练，他们继续训练；操练，他们继续操练。然而，每一种教育都必须是个人的，源于知识，它必须不断地将知识的本质牢记在心，即这一点，它决不能是一种占有，而是自我本身。一句话，应该教的不是知识，而是个人应该走向自我发展；教育学不应该进一步走向文明化，而是走向自由人、主权人物的发展；因此，到目前为止被强烈压制的意志可能不再被削弱。他们确实没有削弱知识的意志，那么为什么要削弱意志的意志呢？毕竟，我们没有阻碍人对知识的追求，为什么要恐吓他的自由意志？如果我们培养了前者，我们也应该培养后者。

孩子般的固执和顽固与孩子般的好奇心一样，都有权利。后者正在受到刺激；所以也应唤起意志的自然力量，即反对。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学会自我意识，那么他显然没有学会那最重要的东西。他们不会压制他的骄傲和坦率。我自己的自由是安全的，不受他的野性精神影响。如果骄傲变成怨恨，那么这个孩子就会用暴力接近我；我不必忍受这种情况，因为我和这个孩子一样自由。然而，我必须通过使用方便的权威壁垒来保护自己免受他的伤害吗？不，我用我自己自由的力量来反对他；这样，孩子的怨恨就会自己瓦解。谁是一个完整的人，谁就不需要成为一个权威。如果坦率爆发为无礼，那么这在一个真正的妻子在她的母性中的温柔力量中或在丈夫的坚定中就会失去活力；必须向权威求助的人是非常软弱的，如果他认为一旦让无礼的人感到恐惧就会改善他，他就做错了。促进恐惧和尊重；这些都是属于死亡的洛可可时期的东西。

那么，当我们审视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的缺点时，我们抱怨什么呢？抱怨我们的学校仍然站在旧的原则上，那就是没有意志的知识。新的原则是将意志作为知识的美化。因此，没有“学校和生活之间的协约”，而是学校就是生活，在那里，就像在学校之外一样，个人的自我揭示是任务。学校的普及教育是一种自由的教育，而不是顺从的教育：自由，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对人文主义的无生命力的洞察力应该迫使现实主义接受这一知识。同时，人们在人文主

义教育中只意识到缺乏任何所谓实践（资产阶级而非个人）生活的能力，并在反对那种单纯的形式教育的同时转向了物质教育，相信通过传达那种在社会交往中有用的材料，不仅会超越形式主义，甚至会满足最高要求。但是，即使是实践教育也仍然远远落后于个人和自由，前者给人以在生活中打拼的技巧，因此后者提供了从自己身上打出生命火花的力量；如果说前者准备在特定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家，那么后者则教人与自己为家。当我们作为社会的有用成员行动时，我们还不是这一切；只有当我们是自由的人，自我创造（创造自己）的人，我们才更能完善这一点。

现在，如果现代的思想 and 冲动是自由意志，那么教育学就必须作为自由人格教育的开始和目标在前面徘徊。人文主义者，像现实主义者一样，仍然把自己限制在知识上，最多，他们期待着自由思想，通过理论解放使我们成为自由思想者。然而，通过知识，我们只成为内部的自由，（这种自由更是永远不能放弃的）；对外，在所有的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下，我们可以继续做奴隶，继续受制于人。事实上，外部自由对于知识来说，就像内在的、真实的、道德的自由对于意志来说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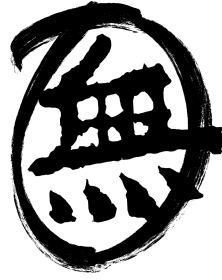
因此，在这种普遍的教育中，由于最低的和最高的在其中相遇，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所有人的真正平等，自由人的平等：只有自由才是平等。

如果人们想要一个名称，可以把道德主义者置于人文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之上，因为他们的最终目标是道德教育。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抗议马上就来了，他们又要教育我们遵守道德的积极法则，而且基本上，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因为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不赞成这种观点，我希望反对的力量被唤醒，自我意志不被打破，而是被转化，这可以充分说明区别。为了将这里提出的主张与现实主义者的最大努力区别开来，例如，最近出版的迪斯特维格的纲领第 36 页中所表达的这样一种主张。”我们学校的弱点在于缺乏人格教育，就像我们整体教育的弱点一样。我们没有灌输任何信念。”我更想说的是，我们从现在开始需要的是个人教育（而不是信念的灌输）。如果人们想把那些遵循这一原则的人再次称为-主义者，那么，在我看来，人们可以称他们为个人主义者。

因此，再次回到海因斯，”民族的强烈愿望，即学校可以与生活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只有当人们在充分的个性、独立和自由中找到真正的生活时才会实现，因为无论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都不会放弃人文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好处，而是将它们都无限地提高，使它们更加高贵。即使是海因修斯采取的民族观点，也不能被称赞为正确的观点，因为那只是个人的观点。只有自由和个人的人才是一个好公民（现实主义者），即使缺乏特殊（学术、艺术等）文化，也是一个有品位的法官（人文主义者）。

如果我的结论是用几句话来表达我们的时代必须转向哪个目标，那么，非自愿学习的必要衰落和在自由人的光辉阳光下完善自己的自我确信的意志的兴起，可以多少表达如下：知识必须死亡，并作为意志再次兴起，每天作为一个自由人重新创造自己。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麦克斯·施蒂纳
我们教育的错误原则
或人文主义与现实主义
1842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max-stirner-the-false-principle-of-our-education#fn_back11

zh.anarchistlibraries.net